

新世纪军旅小说观察手记

——以“茅奖”、“鲁奖”为背景 □朱向前

约近10年前,我曾以《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军旅长篇小说十年估衡》为题,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近10年间,逡迤而出的朱苏进的《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音乐会》、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陈怀国的《遍地葵花》等长篇力作欢欣鼓舞,并乐观地据此认为,这是军旅文学在物欲横流、精神陷落的商业时代的一次强力反弹与成功突围。

可惜,形势总比人强,存在决定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语境淡化,商业语境强化,传媒形式变化”三重夹击的威力逐渐显现,它给当下军旅文学带来的重创就是使一批年富力强的主力作家撤出小说队伍而“触电下海”,其“双刃剑”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可将长篇和中短篇而论之。

一是长篇小说质量的弱化。仅以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为例,军队共推荐了凌行正的《九号干休所》、王海鸰的《成长》、刘宏伟的《地产魅影》、李亚的《流芳记》、歌兑的《拆裂》、王凯的《全金属青春》等老中青三代作家共约10余部作品参评,虽不乏亮点,但比起军队一线作家特别是地方名家的作品来,无论是知名度、影响力还是艺术水准,究竟差着一层。最终,除《拆裂》入围外,其余均铩羽而归。这也是“茅奖”多年以来,军方少有的没有大将出场的一届(此前第七届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上榜;第六届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折桂;再往前推则是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魏巍的《东方》胜出,以及朱苏进的《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音乐会》等轮番冲击,虽与大奖擦身而过,却也赢得评委的不少喝彩)。主将屡屡缺阵,战绩自然不佳。

幸好,近两年来我们又陆续读到一些资

深作家的厚积薄发之作和新近作家的锐意出新之作,并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关注或好评,譬如周大新的《安魂》、黄国荣的《碑》、施放的《弹头十字架》、项小米的《洪荒记忆》、刘春光的《成都老鬼》、王筠的《长津湖》、李西岳的《血地》、王甜的《同胞》、冯骥的《火蓝刀锋》等等(非军旅作家的作品恕不列举)。但他们能否借此项上军中主将的“缺”并跃上当代中国文学的潮头,还有待于读者、评家、时间及市场的综合检验了。

二是中短篇小说队伍的断档。众所周知,所谓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即上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王牌”就是中短篇,从宝刀未老的徐怀中、石言、彭荆风、叶楠等,到风华正茂的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刘兆林、乔良、周大新、朱秀海、苗长水等,“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猛将如云,捷报频飞。《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凝眸》《红高粱》《灵旗》《秋雪湖之恋》《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汉家女》等名篇佳作如波涌浪叠,摘金夺银,令人目不暇接。殊不知,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支队伍早已风流云散,即便坚守在军旅文学阵地上,却也基本上告别了中短篇(恐怕只有裘山山是个例外)。导致于1995年设立鲁迅文学奖至今共5届18年以来,军旅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只有阎连科的中篇《黄金洞》(第二届)、《日光流年》(第三届,而且两部都非军旅题材,而今阎连科也转业多年);衣向东的中篇《吹满风的山谷》(第三届);温亚军的短篇《驼水的日子》(第三届),陆颖墨的短篇《海军往事》(第五届,且作者已淡出文学界多年)等寥寥数篇而已,与红火闹腾的20世纪80年代不成比例,但恰恰从一个侧面真切反映了这一个历史阶段军旅小说队伍的现状,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断档。

所幸,“江山代有才人出”,近年来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了一批青年军旅小说作家脱颖而出,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内唱主角、挑大梁。他们是李亚、卢一萍、朱受鹭、王樾、王凯、王甜、裴指海、曾剑、西元等等。他们不仅仅在军队刊物(如《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等)发头条、出辑,还动辄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国家大刊上露一手,并且在各种选刊上频频亮相(李亚堪称代表),或者在全国性评奖中一试锋芒(如朱受鹭当中篇小说《坝上行》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军队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比起前代作家来,他们受教育条件更优越,眼界更宽,有更好的知识储备、文学修养和写作训练,他们与生俱来的青春气息、时代语境、同龄兵代言人身份等等优势都是不可替代的,并已逐渐在创作中展示了与以往大异其趣的性情走向、审美情趣和语言风格,不由得令人眼睛一亮。

但是,且慢!就青年军旅小说家的整体素质和文学生态环境而言,我还必须指出其三点缺憾。

其一是先天不足。这主要是指那些从军校或从地方大学毕业入伍直接提干的作者,相比较他们的前代作家如李存葆、朱苏进们近10年的连队生活历练,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过来的溶入血液、深入骨髓的兵的体验,比起朱秀海、徐贵祥们的参战经历,在炮火硝烟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刻骨铭心,他们基本付之阙如。如此一来,他们写兵的那一股子血性、豪气和精神就差点意思,同样,要把最枯燥的单兵训练如立正、稍息、四面转法和拔正步等机械动作审美化,看出妙趣写出神韵还不那么容易;要把冷冰冰、硬邦邦的枪炮写出体温 and 脉搏,就更须加把劲了。

其二是后天缺课。当然,这个问题不仅

仅指向青年军旅作家,它几乎覆盖当下全部军旅作家。新世纪以来我军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飞速发展的身影太过神速,留下一道道奔跑绝尘让人们望尘莫及。比如“歼十”、“航母”、精确打击、电子对抗等等新兵器、新战法,我们的作家了解多少?他们获得相关资讯的渠道又有多少?这一课不补上,又如何向国人交出及时反映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艺术而又雄辩的文学答卷。

其三则是文学生态问题。如果说前面两条属于作家主观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条则是客观问题,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读图时代,文学流行浅阅读与搏眼球,一个青年作家要想靠几个中短篇杀出重围,几天几夜不睡。更何况,在一种“政治语境淡化,学术语境强化”的“去意识形态”的理念牵引下,当今学界部分人士无论修史还是编典,都有意无意地“去军事文学化”,曾经所谓“前十七年”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和新时期的“第三次浪潮”,在某些家、选家的眼里视若无物,几乎“归零”。这种倾向虽然暂时不涉及青年军旅小说家的创作,但潜在的挤压是肯定的。

为此,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我提两条对策。第一、积极有效地组织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比如下连当兵,领导干部都要蹲连住班,作家们为何不可?)和把握前沿,到最前线体验的文学经典、遥控室、飞机和舰船上(比如李亚去年刚到海军就被指派随远航军舰去亚丁湾护航7个月,收获则是一批中短篇),给他们补上这一课,以供发酵,以派大用。

第二、大力加强对青年军旅作家作品的宣传推介。别人不说我们自己来选,别人不选我们自己来选,认真出好军旅文学中短篇小说年度选本,并在此基础上运筹谋划“红星经典文库”,少可十几卷,多可几十卷,凡反映人民解放军近百年苦难辉煌且经长时间检验的文学经典,无论长篇、中篇、短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均可入选。毫不含糊地将黄钟大吕之音载入中华民族的奋进长歌之中,既为军旅作家提振士气,又为基层广大官兵提供读本(可发至连队),更为民族精神的传承弘扬和红色经典的积累引导提供参照,一石三鸟,何乐不为?

一个分裂的村庄于微暗中的光亮

□李 厘

相关部门化验,得知结果后开始给县、市、省里写信

并上访,要求清走填埋的垃圾。与此同时,他也弄清楚一件事:张大能拆掉的点将台其实是座汉代王侯墓,里面的文物统统被盗走。这个最后被软禁在学校、总是在思考乡村发展的教师最后以自善其身的方式逃离他无以为力的现实。

霍林村的种种变化,村长老霍是台前幕后的操盘手。从最初与张大能沆瀣一气,到强横地粉碎了林小蛮的夺权计划,并把林家山头卖给城里人做墓地,把霍林村牢牢控制在掌心,都显示了他的老谋深算、善施诡计。当女儿不堪的婚事击垮了他的精神,绝症将夺走他的生命之时,他最担心的还是林小蛮。

村长老霍,以及靠一张嘴、靠伎俩、靠攫取文物和资源发达起来的张大能,就能让一个村庄、让人心分裂败落到如此地步吗?是什么改变了一个村庄,分裂了一个村庄?当人们只看到眼前利益,把未来的发展、把良知的道德抛掷一边,不择手段、一心追求快速和最大化的利益,其后果无可估量。

为了收买人心,让林小蛮当不上村长,村长老霍离世前写下遗愿,用所有存款修一道铁桥,让霍姓人去林家背水。这个隐含狭隘之心的善举不过是亡羊补牢而已。不根治生态环境、不改变惟利是图的思维方式,污染的还将污染,受害的还将受害。

生命和金钱、发展与环境、利益与道德在作品里呈现出凄凉的状态。作品没有给出答案和评价,而是用村长老霍、大饱、二光和林小蛮的故事,以相互交叉的结构,把各种问题——生命的精神的、外在的内在的、表层的深层的、历史的未来的,统统呈现出来,由人评说思考。每个故事之间有交叉点,但都在人物自己的时间轨道上,有的走得很远,有的很近。作品以村长老霍的故事贯穿始终,写出这个土皇上多面性,写出他借别人力之前凄凉的心境。当大饱、二光包括村长老霍看到泡沫一样富起来的霍家人,即将被恶劣的生态环境所毁灭;当一道铁桥即将把霍林两家又连通起来,我们终于看到了霍林村人的醒悟、自我拯救的力量,看到微暗中闪现出的光亮。

社会现实主义新小说

□邱华栋

天大的问题。选取这样的切入口,就可以触动社会神经,就可以创作出接地气作品,就可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李发锁由此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

李发锁是东北人,我们都知道东北人很会讲故事,而讲述当代人的利益纠葛的故事,特别是基层社会那些小人物的故事,李发锁很擅长。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官司》,就是书写了当代矛盾和利益纠葛的一部力作。在《官司》中,人物关系的纠葛,与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是我们当下基层社会的一个丰富的写照。

小说从一场房地产纠纷诉讼案件入手,切入到当下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房产商品化后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纠葛,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访问题。其实,很多上访户的问题看似很具体,但是却反映了新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社会问题。小说的故事情节设定在东北某省的一个基层乡镇中。城建所长王龙一是一个贪婪的基层干部,他相信了风水师赵瞎子的说法,为达到独占财源回地开店的目的,买通了镇长助理毛亩,伙同承建商黄大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为我们的文坛收获了大量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乡土为题材的,而具体写一片村镇、一个村庄历史的,又占了很大比例。例如《秦腔》《美丽的村庄》《天堂》《花堡》等。最近读到的《村子》也是一部写农村历史的小说,但它却更像一部沉重的笔录,其中有作者沉重而锐利的思考。

冯积岐是一位陕西籍作家,做过20多年的农民,工作后又长期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对陕西农村有着非同寻常的了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村子》是冯积岐的第5部长篇小说,与前面几部作品的实验性相比,《村子》的变化很大,它完全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小说采用传统顺时序方式讲述了1979年至1999年20年间陕西关中西府松陵村田、马、祝三个家族的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松陵村的历史。而松陵村这20年的历史折射出的却又是中国农村这20年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农村发生剧烈变化的20年。

中国走上改革道路的第一步是从农村开始的。对于社会来说,它只是完成了一个转型,而对于中国千千萬万农村来说,它们所经受的就是一次艰难的蜕变。改革发生数十年后,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成为诸多作家的关注对象。潘小平、曹多勇的《美丽的村庄》就记述了安徽凤阳小岗变勇掀起的社队分层波瀾,回溯了农村改革历程。而地处西北的陕西农村自改革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和变化,生活在其中的农民的心理情感又有着怎样的激荡,则是冯积岐在《村子》里面所展现的开幕。

小说一开始就吸引了我,套在祝永达脖子上30年的枷锁终于被解除了。对历史来说,30年并不长,甚至很短,对一个人来说,30年则是一个太漫长的时间。30年前,松陵村和祝永达一起戴上枷锁的孩子死了5个疯了两个,而祝永达则坚强地活了下来,并且终于被解除了枷锁。走在田地里的他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下生长出来的”,“心情激荡得厉害”。我以为,开头几段描写祝永达内心的文字是极为成功的,只有长久等待之后终于获得“解放”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自由自在的春风如同脱了缰的牛犊子,很随意地把太阳抓过来给祝永达洒在脸上和身上,他觉得,一丝暖意跟线一样从他心上掠过去了。”

冯积岐时代永远第一个上场,别具匠心,这个人物的生存状态与他生活的时代很一致。作者对祝永达的命运注入了更多的思考,他遭受了数十年的压制,从松陵村的政治生活,到他个人的家庭生活,他都是压抑的,所以,当他以一种获得自由的姿态信马由缰地在麦地里徜徉时,他终于觉得很轻松,终于有了痛痛快快人模人样做一回男人的想法。在当时,“激荡得厉害”的不仅是祝永达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随后,祝永达遇到了另一个获得“解放”的人——马子凯老汉,他也像马子一样不掩饰自己的高兴。他们都压抑得太久了,他们都有“重新做人”的喜悦和决心。马子凯堪称松陵村乃至整个凤山县的文化人,他内心的激荡不亚于祝永达,也正是他给松陵村带来了第一个激荡的波澜。他虽然给自己做寿,但是却间接地传递一个信息,30年的松陵村的一切要变了,松陵村人对马子凯不知该如何应付,他们更不知该如何应付的还有随之而来的分田到户等一系列社会的巨大变化。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面对和迎接这变化。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松陵村的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尤其是曾经备受压抑的人们,《村子》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盲目的乐观。祝永达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他的事业没有任何成就,第二次婚姻依然不美满,马子凯终于盼来了高考的恢复,但他抱了很大期望的两个孙子非但没有参加高考,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村子中的一个个人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内心深处竟然产生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修祠堂。社会在发生变化,人心需要依靠,问题需要“族长”解决。这样的结局令我悲哀,而松陵村却又不会出现别的结果。

冯积岐为松陵村做了一份沉重的历史笔录、精神笔录,并在其中注入了沉重的思考:个人的命运、村子的命运。这才是冯积岐带给我最震撼的地方。

透过祝永达,冯积岐思考的是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命运的改变单得令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像一张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这又是多么现实的事情。小说中的马子凯、田广荣、薛翠芳、赵烈梅、马秀萍等人物似乎都被无形的命运之手左右,无力反抗。个人的命运如此,松陵村的命运亦是如此,村子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谁能给村子带来幸福?祝永达从一个受压抑的人成为松陵村党支部书记,一心想为村里办些事却没有成功,原因是,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强人。

真正的强人是田广荣,他是松陵村的老村支书,为人霸道,用推行强权的方法治理着松陵村的百姓,强奸了自己的继女,对自己家石灰水淹死别人的孩子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可是他却能为村子办成许多事,于是受人拥戴,成为田姓家族的族长,他自感当族长比当村支书更荣耀更受人尊重。面对这样的情景,悲哀的不仅仅是祝永达,而是中国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村子。所以,当现今中国农村的问题恐怕远不止让大家过好日子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精神和价值观。两个村支书,一正一邪,带给农村人的命运是一贫一富,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思考,在价值与生存问题上,到底我们该选择什么?如果我们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是选择了价值,但如果我们选择后者,则放弃了价值,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恰恰是可能选择后者。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都是性格突出,很有特点的。这些人物就是社会基层人物的写真和典型,李发锁将他们塑造得十分生动,而他们的关系纠葛,就是当下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纠葛之所在。最终,读这部小说,我会感觉到,主人公们不屈不挠的为名誉为尊严去斗争,而人性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双方争斗了8年的乡镇店铺,投入资金均超出争夺物本身价值数倍之多,表面看是在争经济利益,实际上是“无赖”的帽子究竟要戴在谁头上的问题。说明了传统道德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与力量,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也概莫能外。小说书写出了事件背后对国人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发锁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以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和它在当下出现所具有文学意义。从创作动机上说,李发锁是一个有着正义感、道德感的作家,他冷静客观地从一件涉法上访案,真实地叙述了一对守法平民夫妻成为无奈诉讼、访民、“刁民”的奇特经历,没有任何煽情,就那么自然地讲述真实故事,但却告诉我们和基层政权,必须要正视的问题:目前多发于基层的涉法上访案,已经成了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痼疾。为什么一件本不该发生的案件却发生了?为什么一件如老鼠尾巴细小的官司却弄出了牛腰粗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司》给我们提出的十分严肃的问题。

有一种品质叫朴实淡雅

——读吕纯晖散文集《出生地》 □木 弓

差不多每天都在读文学作品和其他作品,那是工作。不过作家吕纯晖的散文却是在工作之外读的。就放在手边,随时读也随时放。看那封面设计,很散文那种,是放下还会让人不知不觉拿起来再读的书。书名叫《出生地》,很素朴平实。就先把这一篇找出来读。一读就进去了,才知道,让人放不下的是书本身。

《出生地》写老家的一座老房子的故事。老房子是作家的出生地。当年,这里处于金门炮战的前沿,很紧张。有几个战士也住在这里,和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几十年下来,母亲还在为没有给复员回北方的战士寄去两块钱而后悔纠结,而作家也在期待着有一天能接到远方的信件,希望那战士还健在,还能记起这座可能快要坍塌的老房子。这种情感看似很淡,却像米酒一样,喝着喝着就醉人了,心里还会有些许怅然。相信每一个读到这篇散文的人心情都会惆怅,感觉都会很美好。好散文总会让人有惆怅诗意的感觉。这篇散文不仅是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入当代散文精品行列也一点不逊色。

其实,把整部散文集读透我们会发现,如果说作家心中有一座情感的深湖的话,那么《出生地》就是这座深湖里流淌出来的一条清澈小河,流过我们浮躁的心灵,带来一股清凉的淡雅于宁静。我们在功利社会里时间太久了,整个心态都处于紧张和打拼状态,停一停、歇一歇很有必要,这本书,就是让我们的心休息一下的书。准确地说,这是一本作家的一颗沉静的心在感悟品味生活,同时也让我们懂得感悟品味的书。让这条小河在我们的心头流过,我们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作家并不是想把我们引到超凡脱俗的时空里,感受诗意的美妙。恰恰相反,作家希望我们更深入地关注世俗生活。在对普通人生活的感悟品味中发现一种爱和情怀,提升一种如诗的美感。《出租车司机》可以说是这部散文集中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家通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写出了普通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折射出当今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作家对现实的思考,表达了作家对普通人民的同情与关爱。如今,同情心会被说成有些廉价,是文化人的虚情假意。不过,吕纯晖显然不是这样。她对生活有真切地感受体验,对人民群众有敬爱之心。当我们读到作家为出租车司机留下电话,等着他有一天会打电话来请她吃饭的细节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是一种本真的尊重的情感,无法用价格来标明。这一笔写得很到位,一下子把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全带出来了,也把作家真情带出来了。在《书生被盜记》里,作者对书中小偷的同情确实有过当,受到警察的嘲笑。其实警察自己也说,对这个他抓过好几次的小偷也很不起来。从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人心很柔软的本性;在《亲兄弟》里,作家写到做小生意的病人明知亲兄弟们一边来当看护,一边分光他的那些辛苦钱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善良心态,对这些看似很生活化的细节的准确捕捉都表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和立场并不限于知识阶层的文化不同,而是与生俱来的情感素质和道德品质。这种情感与《出生地》《出租车司机》等作品的思想都是一脉相通的。也许作家永远没有忘记自己就是人民,她的情感就是人民的情感,她的作品的艺术之美也正是来自深沉的人民情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生地》那些写亲情的作品。写这种亲情关系一般人都放得开,有时会放任情感的宣泄。然而,吕纯晖是有意识去控制的。她努力在保持个人情感的真挚性中,通过艺术的表现使个人情感上升到更具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使这种情感更具有人性的价值。一些读者可能会更看好写父亲的《芦苇荡迷踪》,我当然也同意这种意见,但就我个人来说,会对写母亲的《水婆》更有感觉一些。事实上,我是被作品深深打动。这篇散文那样单纯,语言那样平淡,情调那样素朴,把一个母亲写得那样精神,把亲情写得那样动人。这也是作家看似信手拈来,没有刻意,没有夸张,却非常有内涵的好作品。她的作品,写世俗生活的所见所闻,家长里短,却不烦琐闲杂,总能品出点生活的韵味来,让平淡淡然的生活闪炼出光彩。她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刻意求深,细细读来却有说不完的底蕴。一看就知道,她用平常心写作,却在字里行间流淌着并不平常的诗意情怀。能实现这样的艺术表现力,要靠作家的生活积累,靠作家对世态的顿悟,靠作家对散文本性的把握。看得出,作家一定是经过许多生活风浪的,也一定经受过许许多多生活的苦难艰辛。不过在《出生地》这本散文集里,她显然善于化解内心可能处于冲突中的矛盾,以平和的态度写这些平常的事情,感受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表达着对生活的暖爱意意。这正是散文本性中的一种特质,一种品质,要把握并保持这种散文化的品质,其实非常考验作家的思想艺术功力。只有那些深得生活之魂的作家,才能真正在这样朴实的文字平面上呈现这种淡雅的意境风格。吕纯晖正是这样的作家。